



## 二战后日本提供援助与中国放弃赔偿间关系的再探讨

徐显芬

**摘要:**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与此前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之间并没有政策和法理上的关系,而关于两者间关联性的议论大多体现的是围绕“援助”与“历史”的感情纠葛。这个感情纠葛表现在:中国方面觉得已经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日本欠中国最多,应该感恩,应该对中国建设多做贡献;而日本方面觉得已经对中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中国应该对此多加了解,应该感恩;中日双方都对对方抱有一种期待被辜负的挫折感。基于这种感情纠葛,中日间遇到问题时容易形成感情上相互斥责的连锁反应,并因此对两国政府间关系产生影响。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政府开发援助; 战争赔偿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6-0135-06

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时隔七年后的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表明了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意向。

政府开发援助是发达国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援助,是政府间经济合作的一种形式。但在中日之间,日本对中国提供的政府援助是否是战争赔偿的替代品,“提供援助”与“放弃赔偿”间的关联性问题常被提起。

比如2004年12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答记者问时说:“众所周知,对华日元贷款是一种有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互惠资金合作。”<sup>①</sup>对这一发言,《党政论坛》摘编《环球时报》石华文章指出,这“包括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背景”<sup>②</sup>。再如,腾讯网专门开辟“今日话题”专栏(第61期)来讨论经济援助与战争赔偿的关系问题,并在开场白中写道:“中国民间长期以来,一直对日本利用国共对立及国际局势变化,成功免除对华战争赔偿一事耿耿于怀;而与之共生的另一种民间论调,则是‘出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感激,日本提供了大量对华援助’;这种论调不但流行于民间,而且见诸于报端。”<sup>③</sup>但是,至今却鲜见学界对此进行正面探讨。金熙德只是提及日本对华政府援助政策中,“包含着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负罪感和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进行补偿的心理”<sup>④</sup>,但没有展开阐述。林

①外交部. 日国内围绕对华贷款乱发议论中方感到费解. 人民网, 2004-12-02.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7/3029208.html>. 访问日期: 2017-07-25.

②石华. 日本援华的由来. 党政论坛, 2005, (2): 24; 石华. 有特殊政治历史背景 近年来逐渐成为筹码 日本援华的来龙去脉. 环球时报, 2004-12-24. <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4/15314619667s.shtml>. 访问日期: 2017-07-25.

③今日话题·历史版. [http://view.news.qq.com/zt2012/dhyz/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http://view.news.qq.com/zt2012/dhyz/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访问日期: 2012-09-12.

④金熙德. 日本对华 ODA 的成效及其转折. 日本学刊, 1999, (5): 10; 金熙德. 日本对华 ODA 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 2006, (11): 31.

晓光指出,“有良知、有正义感、有历史责任感的日本人将对华援助视为‘替代赔偿’或‘忏悔与谢罪’的物质内容和实际行动”<sup>①</sup>,但也没有进行论述。那么,日本的对华援助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性?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中国为什么决定接受日本的政府贷款,而日本在决定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时主要考虑了哪些因素,发现日本对华提供经济援助与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间并没有法理上的关系。而关于两者间关联性的议论大多体现的是围绕“援助”与“历史”的感情纠葛,那么,这种感情纠葛又是如何错综交织、连锁展开的呢?

## 一、中日达成的基本精神:互惠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

中国决定接受日本政府贷款是一个非常慎重的过程,期间经历了从1978年7月决定引进民间贷款到同年11月决定接受日本政府贷款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刚好与中国摸索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过程重叠。

1979年以后,中日开始就日元贷款的实际业务进行政府间的协商。在协商日元贷款过程中,中日双方达成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纳为互惠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关于互惠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中日双方都回避使用“援助”一词,而强调是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大平在1979年12月6日与邓小平的会谈上说,“我国本着要对贵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尽可能的合作的立场来讨论该问题”<sup>②</sup>,强调了“合作”的说法。2. 在选定具体利用日元贷款的建设项目时,中方充分考虑了中日双方的利益<sup>③</sup>。3. 照顾中日双方的相互利益,这一点是当时中日双方当事人反复确认过的原则。4. 在实际协商过程中,中方则强调要尊重日方意见。12月6日邓小平听了大平首相关于日元贷款的表态后,明确表示在建设项目选定以及贷款金额问题上,“应该尊重日本政府的考虑”<sup>④</sup>,华国锋也在与大平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明确表示“尊重日本的意见”<sup>⑤</sup>。

国际协调主义主要体现在日本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上。当时针对日本对中国开始提供政府贷款,国际上疑虑甚至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三方:首先,在欧美国家产生了对日本垄断中国市场以及“中日勾结”的担忧。其次,东南亚各国担心日本的对外援助会被庞大的中国吸引走,而自己获得的日本援助会因此减少。还有,苏联对日本对华援助表示了反对。对这些外界的干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协调主义,屡次作为政策表态强调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早在1978年9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园田直外相在纽约与黄华外长的会谈上就提出了这些原则<sup>⑥</sup>。1979年6月,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柳谷谦介在与外交部亚洲司长沈平的会谈中特别提醒“中方理解这一点”<sup>⑦</sup>。9月3日,大平在与谷牧的会谈上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12月6日,大平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上再次郑重其事地明确表明了这三原则<sup>⑧</sup>,第二天在政协礼堂的演讲中还强调了这一点。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的具体内容就是:谋求与欧美各国的协调,考虑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平衡,不对中国进行军事合作。

日本在与中国就日元贷款进行外交协商时,反复强调日本“一国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今后要与欧美保持密切联系”<sup>⑨</sup>,并直接要求中方不仅只要求日方的合作,而应同时寻求其他欧美国家的合作<sup>⑩</sup>。当时日本国内普遍认为中方对日元贷款的期待非常之大,对此,外务省煞费苦心“不要让中国抱有不切实

① 林晓光,孙辉. 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 现代日本经济,2005,(3):8.

②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开示文书. 16/04-589/5.

③ 具体情况,请参看徐显芬. 互惠与国际协调:亚洲冷战融解过程中的中日关系//崔丕,青山瑠妙. 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277-278.

④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开示文书. 3/01-1378/3.

⑤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开示文书. 3/01-1378/2.

⑥ 読売年鑑,1980:151-152.

⑦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开示文书. 3/01-1981/2.

⑧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开示文书. 16/04-595/15.

⑨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开示文书. 18/04-1005/4.

⑩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开示文书. 18/04-1005/5.

际的幻想”<sup>①</sup>。对此，中方虽然对日本抱有很大的期待，但并不希望过多地依赖日本。12月6日当大平首相提到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时，邓小平当场就表示理解。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中国与多个国家签订了外贸协定<sup>②</sup>。在引进外资方面，中国向多国提出了政府贷款的要求，并与多国签订了引进资金的协定<sup>③</sup>。

从以上政策决策过程、中日间政策协商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以及中国并不希望过多依赖日本等情况来看，可以说中国决定接受日本政府贷款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日本决定对华提供政府援助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的国际环境。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在日本对华援助成立的决策过程中，援助与历史问题的关联性并没有成为议题。

## 二、“援助”与“历史”的关系

回溯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国在决定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时，并没有希望日本对华提供经济援助的相关讨论。在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的第一天，田中角荣首相面对媒体强调了中日间不存在放弃赔偿与给予援助之间的交易。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记者的问题——“为了报答这个”（指的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笔者注），日本方面是否有今后要对中国的国内建设进行合作的精神准备”，田中回答道：“这完全是单纯的‘放弃赔偿，我们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不是什么交易，不是那种‘你放弃这个的话，我就给你那个’的讨价还价。（中日关系）必须基于东洋人最为重视的基本姿态、基本精神出发。”<sup>④</sup>

实际上，中方并没有认为对日本放弃了战争赔偿，就理所当然要从日本方面获得经济援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方多次向中方提起可以给中国提供政府贷款，但中方多次断然拒绝<sup>⑤</sup>。中国决定接受日元贷款是在1978年底，提出申请是在1979年，还是应该理解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环而引进日本政府援助的。换言之，中国并没有想过，作为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回报而向日本方面要求经济援助。另一方面，从已有的档案资料看，日本方面并没有想通过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来实现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作出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进行赎罪这样的政策目的。

确实，中国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要求的理由有多个，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道义论。至少，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就在中日间关系上形成了道义的制高点。1972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向三木武夫前外相谈到不要求战争赔偿的理由时讲道：“我们中国人民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者，想起来日本国民也是牺牲者。牺牲者从牺牲者那儿获取金钱是‘没道义’的，所以我们不要。”陪同三木在场的秘书官国弘正雄回忆道，当时就禁不住想：“（日本）在道义层面完全输了。”<sup>⑥</sup>

基于这种道义感，在日本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心情”——即“深深感谢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以大人的姿态与日本交往的态度。无论如何也希望中国人富裕起来，希望能为中国实现工业化作点贡献”<sup>⑦</sup>。实际上，日本在决定提供援助时，对于放弃了战争赔偿的中国应该给予特别的照顾——这种“感情”确实存在过，比如1979年12月1日，就在将要陪同大平首相访华前夕，时任外相大来佐武郎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道：“一部分日本国民，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感情，即因为中国对我们放弃了（指战争赔偿——笔者注），所以日本有必要给予回报。”<sup>⑧</sup>并且，这种“感情”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过作用，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确认。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揭示文书，6/02-1170/2。

② 除了1978年2月与日本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外，4月又与欧洲共同体(EC)，12月又与法国，1979年3月又与英国之间缔结了长期贸易协定。

③ 比如，1979年8月中国向世界银行提出贷款意向，而且也向美国、西德等欧美各国提出了政府贷款的要求。实际上，到1979年9月为止，中国已经与多国签订了引进资金协定，包括从法国引进70亿美元、从英国引进50亿美元、从加拿大引进20亿美元、从意大利引进10亿美元的协定。请参看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揭示文书，18/04-1005/9。

④ 竹内实，日中国交基本文献集，著々社，1993：224。

⑤ LEE C.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113.

⑥ 国弘正雄，新しい日米・日中を考える，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10，1988：47。

⑦ 居林次雄，财界総理側近録——土光敏夫、稲山嘉寛との七年間，新潮社，1993：157-158。

⑧ 日本経済新聞，1979-12-02(4)。

一是在日本政府决定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决策过程中,作为一种说服论理发挥了作用。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包括政界、官界、财界以及媒体都普遍认为,考虑到过去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应该对中国经济建设给予援助<sup>①</sup>。所以基本上没有反对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声音。但在商定对华援助规模时,当时日本政府内存在反对对华日元贷款的规模超过当时日本最大援助对象国印度尼西亚的声音,外务省主张“至少第一年度金额不超过印度尼西亚”<sup>②</sup>,对此通产省则反驳说:“对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中国,就应该积极地予以合作”<sup>③</sup>。

二是日本对中国的日元贷款采取了“多年度总额方式”,这是一种特殊的方式。通常日本采用单年度方式,即每年与受援国协商确定下一年度的援助额度。而在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时,则采用了5—6年为一轮、事先向中国提示总金额的方式,以便中国将日元贷款作为五年计划的配套资金做全盘考虑。就是否向中国提供多年度贷款总额的问题,日本政府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是首相裁决作出的决定<sup>④</sup>。之所以作此决定,很大程度是因为有“对过去的问题的考虑”<sup>⑤</sup>。

这种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报恩”感情,对后来决定对华提供援助的过程中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关于中日两国领导人就日本对华援助和中国放弃赔偿问题的对话,我们在日本的外交档案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幕:1984年3月24日,访日的胡耀邦总书记在与中曾根康弘首相举行的首脑会谈上,对日本对华经济合作表示感谢,对此中曾根首相则回应道:“刚才贵总书记对日本的对华经济合作表示了谢意,这倒反让我感到惶恐,对华合作,是对由于战争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的反省的表现,是理所应当的事情。”<sup>⑥</sup>这里中曾根表达了这样一种感情:对华经济援助,是对过去战争的“反省的表现”,是日本“理所应当”做的事情。

概括而言,日本提供对华经济援助与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两者之间不存在政策和法理上的关联性,而后来很多关于两者间关联性的议论,基本上是基于一种感情纠葛的讨论。

### 三、“援助”与“历史”的感情纠葛

中日间在日本对华援助与历史问题的关联性问题上存在着很复杂的感情纠葛,它第一次成为中日间的外交问题,是在1987年。这年6月4日,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也率领的访华团时,要求日方妥善处理光华寮问题,然后谈了对中日关系整体的看法。邓强调“总的前提是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接着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帐最多的国家”,“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我们没有因此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sup>⑦</sup>。概括地说就是,“日本是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但中国并没有要求赔偿,所以日本应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放弃赔偿要求与日本欠中国最多的逻辑关系,而欠得最多与应该多做贡献的逻辑关系,第一次在中日间的外交场合中公之于众。

围绕这个“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发言,中日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驳斥。对于“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日本方面吐露了不满,说日本已经以经济合作方式做了很大贡献,难道中方领导人都不知道。6月4日傍晚,“外务省首脑”<sup>⑧</sup>发言说:“感觉邓主任也成了云上之人了。日中关系以经济为中心正稳步地发展,这已成为一个大潮流。希望邓主任更多地听听这些实际情况”<sup>⑨</sup>,指出邓小平“没有把握日中关

① STORY G.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China: A Survey. Pacific Economic Papers, 1987, (150): 3-11.

②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開示文書. 16/04-595/6.

③ 日本经济新闻, 1979-11-04(1).

④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開示文書. 16/04-595/16.

⑤ 金熙德. 中日关系复交30周年的思考.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198.

⑥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開示文書. 18/04-1029/3.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1192-1193.

⑧ 中曾根首相在1987年7月9日上午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言道:“外务省首脑的发言是柳谷前外务次官在非正式的恳谈会上说的。”

⑨ 朝日新闻, 1987-06-05(3). 日本经济新闻, 1987-06-05(2).

系的实况”<sup>①</sup>。

外务省首脑的这个“云上之人”发言，引起了中方强烈的不满。6月6日晚上，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唐家璇召见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汤下博之公使（临时大使），当面提出了抗议，“日本外务省的现职高官都搞不清最低限度的外交上的礼仪，公然恶毒地攻击我国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重大事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向日本政府抗议”，要求日方作出真实意思的说明，并采取“适当的措施”<sup>②</sup>。第二天（6月7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批评外务省首脑的发言非常傲慢，并批判道：“不是（中国向日本）低头请求什么的关系。如果外务省认为，中国因为贫穷，想要借钱，就给我闭嘴，那么不得不认为这是过去的日本的意思。”<sup>③</sup>

对于中方的驳斥，日本外务省再次进行了反驳。外务省认为，日本也有必要“应该说的就说出来”，以此来回应中方<sup>④</sup>。6月8日，外务省亚洲局长藤田公郎约见驻日公使衔参赞徐敦信到外务省，说明“并无诽谤、攻击中国领导人的意图”，给中国方面带来不快的心情深表遗憾，但同时主张外务省首脑发言也有其理由，说道：“中国领导人最近就中日关系所做的讲话，是在与日本的实际和日本的认识‘有偏离’的基础上‘公然对日本进行批判’，是对认真希望发展日中关系的人的热情‘泼了冷水’”<sup>⑤</sup>。

对此，中方再次进行了驳斥。6月1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正式批评了日本外务省，“有意将责任转嫁给日本新闻界，甚至还再次曲解邓主任的讲话，我们对这种态度实难理解”。新闻发言人谈话中将邓的发言定位为，“全面阐明了中方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语重心长地就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善意的劝告”，批评日本外务省的某位官员“公开对邓小平主任进行恶意攻击，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给中日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sup>⑥</sup>。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以及在野党都对日本政府对待外务省首脑发言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批判。最后，6月15日外务省事务次官柳谷谦介在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正式表明遗憾之意，18日声明辞职，之后此次中日间的外交争论渐趋平息。

在这次争论中，中日间的驳斥与反驳的关系构图很明显，但相互斥责的内容却不相吻合。从这一系列的连锁驳斥中，可以看出以下这些“感情”的撞击。第一，中国方面存在这样一种心情，即尽管中国在日本的残酷侵略中遭受巨大损失，但还是放弃了赔偿，对此日本方面应该感恩。本来，邓的发言是针对光华寮问题的不满，但生气时道出了“欠得最多”的想法。第二，日本方面存在这样一种心情，即日本通过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领导人应该了解，中国方面应该感恩。这种感情，以“外务省首脑”回应中国的驳斥中表达了出来。第三，中日双方都对对方抱有一种虚构的挫折感。从中方的发言中可以感到对日本经济处于劣势的意识上的痕迹。日本外务省首脑的“云上之人”发言，在中国眼里看来，那是援助国日本的“家长主义”作风。前述孙平化的发言正体现了这一点。而从日本方面来看，存在“该说的没有说出来”的挫折感。外务省干部说明反驳中方的合理性时，就说日本该主张的就主张，该反驳的就反驳，如果不那样的话，“就会给国民造成一种日本对中国俯首听命的印象，甚至会助长国民回归战前民族主义的气焰”<sup>⑦</sup>。

两年后的1989年11月，邓小平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就中日关系说道：“希望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sup>⑧</sup>从这个角度讲，这次外务省首脑的发言，在中国的眼里看来就是日本“自大”的表现，这刺激了中国的“自卑”心理。

事态在“外务省首脑”柳谷谦介辞职后逐渐平息下来。但是，这种感情上的相互斥责的连锁反应，在

①人民日报，1987-06-08(6)。

②日刊中国通信，1987-06-15。

③中国総覧，1988：137。

④朝日新聞，1987-06-09(2)。

⑤人民日报，1987-06-10(6)。

⑥人民日报，1987-06-11(1)。

⑦日本経済新聞，1987-09-14(2)。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298-1299。

之后的中日关系中还多次重现。比如,1995年日本政府以冻结无偿资金援助来对中国政府实施核试验进行制裁。对此,中国方面则以“历史”进行反驳。同年9月19日,李鹏总理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团长丰田章一郎(经团联会长)时就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曾经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害。日本对华贷款与它是难以匹敌的”<sup>①</sup>,将政府援助与战争损害相关联,批判了日本利用政府援助制裁中国的做法。

之后,日本方面将中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是否有“感谢之情”与历史问题直接挂钩起来,流露出强烈的希望援助抑制“历史问题”的期待,这就造成了“日本援助”与“中国感谢”及“中日历史问题”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sup>②</sup>。这种感情愈演愈烈,直到21世纪前十年的中期,成为日本议论终止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新项目的重要理由。

#### 四、结 语

中日之间,围绕着“历史”与“援助”,存在着“双重感谢”论。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在历史问题上中国的宽容,形成了“日本该感谢,中国被感谢”的关系构图。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华之际表明了日本给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在经济援助上日本的大方,形成了“中国该感谢,日本被感谢”的关系构图。

其背后,存在着“双重恩仇”论。中国虽然遭受了日本的残酷侵略,却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有恩于”日本。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非常大度地提供了近30年的政府援助,日本“有恩于”中国。施恩于人则期待对方“报恩”的感情,在中日双方的反应中都能看出来。当感到“报恩”的期待被辜负,则“恩将仇报”的抗拒感情就爆发了。

中日两国间由于“双重感谢”论的复杂交错,“很容易伴生类似于一方骂对方忘恩负义,另一方骂对方是为变节者的相互责难的感情”<sup>③</sup>。21世纪头十年里,两国间的国民感情在相互斥责的连锁反应中不断地变得乖僻别扭,似乎今日仍在延续。

## Re-exploring on the Linkage between Japan's ODA and China's Renunciation of War Reparations

XU Xianfe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linkage between Japan's ODA to China and China's renunciation of war reparations. It denied that there were relations of policy and jurisprudence between the two, but it found that there were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a “dual appreciation argument” exis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 “dual obligation argument” was also generated, and behind this, a “dual gratitude and revenge argument”.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e chain reac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emotional resistance to each other was distorted more and more.

**Key words:** China-Japan relations; Japan's ODA to China; China's renunciation of war reparations

● 收稿日期: 2017-06-26

● 作者地址: 徐显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 200062。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SS029);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3PJC036)

● 责任编辑: 桂 莉

① 中国内外动向, 1995-09-30, (605): A4.

② 请参考徐显芬. 日本的对中 ODA 外交: 利益・パワー・価値のダイナミズム. 劲草书房, 2011: 233-244.

③ Foreign Affairs, Japan (フォーリン・アフェアーズ・ジャパン) 編. フォーリン・アフェアーズ傑作選 1922-1999: 下. 朝日新聞社, 2001: 12.